

公正合理的回报才是股市“兴奋剂”

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不单单在于上市公司吝于分红、垃圾股“死不退市”和新股发行过快,更在于证券市场让人看不到公正的保障和长远的信心。

评论员观察

□本报评论员 崔滨

2011年股市收官日,沪综指停留在了2199.42点上,被股民们戏称“要救救市”。在8日结束的国务院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上,股民们终于盼来了“提振股市信心”的三项部署。

“救市”之说并非耸人听闻。纵观2011年的A股市场,上证综指以21.68%的跌幅领

跌全球各主要股指,自去年4月中旬以来,沪深两市全年市值缩水6万亿,约89%的被调查投资者出现投资亏损,其中35%亏损超过50%。中国股市在经历10年风雨后,出乎很多人意料地走到了原点,或许也是个转折点。

在各方分析人士看来,温家宝总理8日指出的“抓紧完善发行、退市和分红制度”三大“提振股市信心”措施,可谓正中中国股市重融资轻回报,新股发行频率过快和退市、监管制度不完善这三

大顽症。

根据统计,2011年277宗IPO使得几乎每个交易日都有新股发行,以IPO、增发、配股等形式的融资高达8248.86亿元。过度“圈钱”严重稀释了股市的进场资金,阻隔了股指整体的上涨和广大股民从中获利的希望。

同时,中国证券市场制度设计中重融资轻回报的缺陷,使得上市公司将广大中小投资者当成唐僧肉来宰割,有人统计,10年A股历程,普通散户所分享到的股票红

利不过0.54万亿元,但他们所要承担的印花税、申购费等交易成本却高达1万亿元。

更令人失望的是,多达近百只“垃圾股”,因为退市制度的不完善,以“两年亏损一年微利”的花招“僵而不死”,严重扭曲了股市分配资源的功能,使得大多数散户的利益被少数人侵占。

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不单单在于上市公司吝于分红、垃圾股“死不退市”和新股发行过快,更在于证券市场让人看不

到公正的保障和长远的信心。

因为对长期收益没有信心,不论是机构还是散户,只会拼命把眼前的微末收益吃光分净;因为股市“经济晴雨表”功能的丧失,才会出现一条利空消息便让投资者如惊弓之鸟,千条百条利好也换不回股指上涨的窘境。

正如此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,面对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匮乏,证券业首要的任务,是“完善市场制度,加强行为监管,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”为根本

要务,而“完善发行、退市和分红制度”则是眼下改变中小投资者弱势地位的首要任务。

中国经济经历了10年的高速增长和2008年的4万亿投资,不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,都有足够的资本用于证券投资和救市护盘。因此,真正能够清除制约股市健康发展的沉疴,提振股民信心的,还是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公平、合理的证券市场交易制度,并完善对这一制度的监管。

>>声音

我到过一些学校,看到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,可以支配院长、系主任,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,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,就好像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。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,系里很少称呼我“温主任”的,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。

——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说。

市场化的问题并非是中国作家的独有遭遇,美国的作家亦如此。现今中国的商业化与市场化再彻底,也比不上美国社会,但美国能出现海明威和福克纳等作家,不断产生伟大的作品,这值得思考。

——作家李锐说。

国民性的问题是当年鲁迅提出来的,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。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,物质生活富裕了,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,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,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。

—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教授说。

本来我也是在书斋呆着,没想出来发言,但我性子比较直,2003年左右大学开始扩招时,大学状况实在太糟了,忍不住了就出来写评论。后来写着写着就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了,总觉得要去管这个事情。如果教授学者都不管,谁管呢?

——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。

2012年是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关键一年,不仅房地产的价格会实现合理的调整,而且更为重要的是,房地产体制改革方面有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,其核心就是保障房政策逐步向城市夹心层倾斜。

——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说。

日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,经济增长率高达9.2%,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,增长率降到3.8%,而在1990年以后,人口红利消失,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.89%,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。

■本版投稿信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

开不进村的校车,标准再高也是枉然

□杨于泽

据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报道,在近日召开的“校车新国标”征求意见会上,由宇通集团执笔起草的新国标被指完全套用美欧标准,不符合中国实际。与会官民代表都认为,应设身处地更多站在农村、了解农村的角度来制定校车新标准。

任何车型设计,既要考虑一般安全需要,也要考虑市场定位及目标市场的道路状况等外部条件。校车在中国,以前也是有的,但随着中小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问题日

益暴露,校车出现了大面积推广的需要。制定校车新标准,就要研究校车的主要市场在哪里,那里的道路状况如何,还要考虑那里的购买力,否则相应产品就缺乏针对性。

校车是接送孩子上下学的专用客车,农村需要,城市也需要。但校车安全事故的地区分布表明,校车市场主要在农村。去年最后2个月,各地发生5起校车事故,全部在农村,共造成43名农村学子死亡。城市学生一般能够就近入学,公交也发达且安全;而

在农村,近十年来推行“撤点并校”,坐校车已经成了孩子们上下学的必需。

农村校车的安全问题,首要的并非校车本身安全性不足,而是事实上“校车”多是一些替代品。近期发生的农村校车安全事故,与其说是暴露了校车的不安全,不如说是揭示了农村学校没有正规校车的实际。

要使校车在农村达到普及程度,就必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,从型号设计上控制校车制造成本。我国在农村地区推行“撤点并校”,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51万余

所,到2009年只剩下23万余所,每天减少63所之多,可见农村校车普及任务之重。给中国校车“安”上美欧标准,普及校车的财政压力更大,有关部门自然更难下普及校车的决心。

既然主要市场在农村,定校车的标准,还必须考虑农村道路条件。此前媒体公布的新标准校车示意图,明显是个庞然大物,因为大而显得安全。而农村“村村通”公路宽3.5米,甚至更窄,一辆小车与一辆三轮车会车都难。要在“村村通”公路上通行新标准校车,交通堵塞将是经常的事。这诚如财政部官员所言,有了高标准校车,开不进农村,也是枉然。

前一阵子,有些媒体向国内民众推介以美国“长鼻子”为代表的国外校车,无法证明发达国家对校车安全的高度重视,并非要求政府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标准。

中国的校车,固然有现行安全标准偏低的问题,但更大的问题是变“无”为“有”,当务之急是普及。将来制造的校车,一定要经济适用,便于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,并且能在“村村通”公路上跑起来。

对“吃空饷”者不妨定个“诈骗罪”

□林萧

在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,有一名叫王烨的科员,2011年7月从山西省中医院本科毕业,当年10月第一次到省疾控中心上班,却从5年前入读大学时,就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、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,5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,共计10万余元。目前,山西省纪委已与山西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成调查组,正在进行调查。

如果王烨果真在5年领

取空饷10万余元,显然不是常人能做到的,事实上她有一个做县委书记的父亲。在“拼爹现象”日渐激烈时,发生在山西省的这起事件再次敲响了制度的警钟。如果说“萝卜招聘”一度让人感慨公权力的倾斜,那么“吃空饷”的性质以及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恶劣,因为“萝卜招聘”毕竟需要走过场,需要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,而“吃空饷”却不在其位谋取其利,不付出劳动就获取薪酬。

近年来,有关“吃空饷”的新闻层出不穷。据媒体报道,2005年8月,四川省南充

全市清理出2323个“吃空饷”的人;2006年,甘肃省发现“吃空饷”者908人;去年福建龙岩出现的“最牛公务员”事件,9年没有在单位上过一天班工资却照发,被称为“吃空饷”的“杰出代表”。“吃空饷”之所以屡禁不止,无非是一些人将“饷”当成了“唐僧肉”,再加上公权力的滥用,这才导致各地“吃空饷”之风愈演愈烈。此外,监管的缺失和惩处力度的不够,“吃空饷”者一旦被查处也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,大多以退款、罚款了事,违法成本的低下,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更多的

人铤而走险。

我们相信只要有关方面认真调查,查明事实并不困难。如果“吃空饷”行为得到确认,完全可以从法律的层面解决,以儆效尤。对“吃空饷者”,不妨定个“诈骗罪”,使之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按照我国《刑法》第266条的规定:“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,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”。用“诈骗罪”来定义“吃空饷”的行为,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。首先,“吃空饷”者往往以伪造、弄虚作假等手段,骗取国家工资福利,

是一种明显的欺骗行为。其次,“吃空饷”者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。依照《刑法》的规定,骗取公共财物2000元以上即认为是犯罪,3万以上可判3—10年有期徒刑,20万以上可判无期徒刑。

因此,笔者建议相关部门,对于“吃空饷”的行为,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,并严格将《刑法》作为量刑依据,以“诈骗罪”论处,方能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。此外,对于幕后的权力黑手,违法违规操作乱象,同样必须依法严惩,多拳出击,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。

读者来信

充州带了个好头

编辑:

你好!

齐鲁晚报1月7日报道,充州市宣布,从今春新学期开始,全市1.7万名适龄幼儿将享受免费学前教育,2008年,充州已在全省率先免除高中学费,这也就意味着该市学前三年至高中阶段共15年教育全免费。这个消息让人感到振奋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二条明确规定,“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。”可喜的是,一些地区在发展了之后,并不墨守成规,开始站在更高、更长远的角度,谋求加入高中阶段的12年,以及加入学前阶段的15年义务教育。先行一步的地方可能给其他县市带来“压

力”,但事实证明,只要是真正为民着想,真正能让群众受益的事情,就会有群众的坚决支持,而群众的支持无疑是政策与制度得以实现和稳步推进的基础。

读者:刘鹏

为免费教育拍手叫好

编辑:

你好!

读罢1月7日《齐鲁晚报》报道的《充州实现15年免费教育》一文,真的是感慨又感动!在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时,充州市开了全省15年免费教育的先河,不能不令读者竖起大拇指。

对收入低、条件差的农村家庭而言,孩子的幼儿园学费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建。很少有不爱孩子的父母,但“高昂”的学费只能

令家长“望而却步!”像充州市这样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,就解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。孩子到了入托的年龄就上幼儿园,这样孩子既能更系统更全面地接受教育,家长也能更有时间干工作而增加收入。

希望免费教育之花在将来开遍齐鲁,让这惠民政策深入人心。同时,我更为充州实施的免费教育拍手叫好!

读者:黄礼宗

抢票软件无异于
“流氓软件”

编辑:

你好!

《齐鲁晚报》1月8日报道《网络购票喊挤,抢票软件热销》,我认为用软件抢票其实就是“网络加塞”,抢票软件就是典型的“流氓软件”。

铁路部门推出网络购票的初衷是为了给旅客提供便利,尽可能地节省购票成本和时间。相对于大多数农民工,经常使用电脑的人事实上已经抢得先机了,现在一些人还利用技术优势,通过“刷票程序”去抢更大的便宜,让人情何以堪!因为一些人处处都想占便宜,就给不法之徒提供了诈骗和“钓鱼”的机会。目前,很难保证哪一个制度和程序完善到无懈可击,在罪与非罪的边缘,一个具有社会公德的人应该自觉地参与到公平的竞争中,不要总想着找漏洞、走捷径。

读者:吴文怡

为“敲门砖”考研不值

编辑:

你好!

本报公益热线随时为您服务

气象热线:96706 公告挂失:96706

日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

时期,经济增长率高达9.2%,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,增长率降到3.8%,而在1990年以后,人口红利消失,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.89%,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。

■本报投稿信箱:
qilupinglun@sina.com